2008

50

19

——

20

——

“ ”

“ ”

除夕的灯火

□海 田

除夕之夜，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部接受中央军委命令后，立即奔赴湖南郴州灾区执行电力抢修任务。青年诗人海田为官兵们的战斗精神所感动，创作了诗歌《除夕的灯火》。本报特编发此诗，以飨读者。 ——编 者

23:30

2 5

8

200

——

14:30

4

“ ”

6

11

11

110 9 720

21 3

25

……

6

8

……

“ ! ! ——! ”

2008

新写实小说的亲和力

□张利红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被称之为“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Mass culture)”的舶来品经由港台入驻大陆。短短十几年，它就成了中国文化大众文化的主流。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进行了一场文学分类学意义上的裂变：大众文学以其世俗化的写作态度和文本特色征服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原因很简单，文学艺术从来都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显著表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领域开始了深刻而又漫长的体制变革，而“市场经济”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关键词。大众开始重视的是生命的情趣与现实的感官体验，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位移到对文学的审美上，就演变为：大众期待作家成为“走下神圣殿堂、遍识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并受到欢迎的作品，也是那些能“书写衣食住行、关注人生冷暖”的世俗画卷。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催生出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样式几乎是必然的：“新写实小说”由此行世。

显然，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具有以大众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的世俗化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多元化的景观中，“新写实小说”以此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作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作家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创作的关怀世俗男女生存的作品非常令人兴奋。此外，“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话语表达也是大众式的，选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流行语、甚至俚语，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与破碎化感受。“新写实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也是普通百姓，男人们多是为生存奔波的“小人物”，女人们多是为家事操劳的“黄脸婆”，人们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新写实小说演绎着大众文化的万种风情，消弥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精神隔膜，让读者面对生命之真实，建立起了大众文化中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形态。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豆腐变馊”事件引发的夫妻口角，排队抢购大白菜，同保姆斗智斗勇，妻子调转工作，孩子入托、老家来亲戚串门……池莉的《烦恼人生》描写的也是工人印家厚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下班回家的平凡一天中遇到的诸多不如意的事，一系列庸常琐碎的生活细节纠缠着他，令读者感觉到生活的沉重。这种平静笔调下的平谈生活含有一种震慑的力量，使人惊诧于平淡生活表面下的沉重和人与生活对抗中的渺小。

方方的《风景》同样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力作。小说描写的并非是题目惯常使人联想到的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一副让人看了顿生厌烦的生活画面。小说展示了汉口一个普通码头工人家庭穷困艰辛的生存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带着老婆和九个子女长年居住在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每隔一段时间便从屋子旁边呼啸而过，过多的子女拥挤于并不宽敞的屋子中，于是，全家人都在困苦的生活中极力挣扎。生活的沉重过早压在了孩子们的肩膀上，三哥凭借强健的体魄成为家中的“二霸王”，五哥、六哥倒插门“嫁”到了汉正街，七哥为了从“地狱”爬到“人间”不择手段，娶了一个不能生育家里却有背景的女人，大哥也因为贫穷长期娶不到老婆，被邻居一个已婚女人看中，成了那个女人的情人，二哥则在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幅让人看了惊诧继而辛酸的风景。人们挤压在社会底层，为生存境遇的改变而苦苦挣扎，作者如生活流水般讲述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史与生命史。

还有两位游走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女性作家，王安忆和徐坤也应在此一提。

《长恨歌》就是王安忆世俗化写作的典型代表。文本的叙述虽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没有描述大起大落的历史故事，而只是再现了一个上海小户人家女子平凡无奇的生活经历。女主人公王琦瑶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小家碧玉”，在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中，凭借其清秀的外貌当选过“上海小姐”，后又涉足电影界，并长期被人包养，但她却丝毫未有明星的光环和贵族的气质，最终被人悄然离弃，只剩一人黯自悲伤；到了解放后，尽管历史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王琦瑶却凭借其小心谨慎和女人的聪明敏感，平安地度过了一段段非常时期，她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在平衡了各种关系之后日子过得依然不失情趣，得体的衣装，精致的器皿，妩媚的身段，摇曳的舞姿……可见，文本不着意于历史的重大主题与时代的沧桑，而着力于如何烧菜、穿衣、煮茶这一类零碎的琐事，在展现了一个精明的上海女人平凡一生的同时，却显示了作家放低姿态、回归大众的独特视角。

徐坤于90年代在中国文坛崛起。她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局限于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以理性方式追问知识分子的存在，而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关注凡夫俗子们在世俗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充满一种大众关怀。其中篇小说《沈阳啊沈阳》，描写的是现今工人们都下岗分流的社会现实，以及在这个背景下自家亲戚和普通市民们的命运。小说《乡土中国》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传统家庭过去和现在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中家庭长子长孙虽曾弃家出走、未尽孝道，但家族最终接纳了他们，而长孙女虽为家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却因几句口舌而被迫退出家族的大聚会。这一巨大的反差充分反映了“乡土中国”的“重家族”和“重男轻女”。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感受和对世俗人生的真切体认给了徐坤无穷的创造力，使得她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以客观平和的心态去言说现实的生活平面、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对于一个身居精英行列、习惯了理性思维的作家、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在新写实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缠绵缱绻，都是挣扎于原生态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群人在人格上既不崇高也不猥琐，在道德上既非大善也绝非大恶，在行为上既不蝇营狗苟也不超群绝伦，是一群身处善恶之间的普通人。这类人物的出现表征着“文学造神时代”的终结，平常人、平常事成为新写实文学的主角，适应了大众的文学口味。作家从容不迫地叙述着中国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并将其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并提升至本体性地位，对于文学的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它让文学以平民化的身份，以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出现于大众视野范围之内。

与接收当代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观念与技巧的先锋派比较，新写实小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哺育的，使我们多了一份亲和力与认同感，它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其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真诚地直面人生的态度，使得新写实小说具有了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兼顾、善于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艺术特色，因而使它在90年代是一种极具人缘与口碑的小说类型，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低谷中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的大众化写作影响深远，但一不留神，某些作品的琐碎和庸常便磨损了思想的广阔与深刻，这是新写实小说创作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

情由心生

——读李秋散文集《你让我的冬天绿过》

□高天庆

描写宏观世界的大题材、大场面的大散文固然能让人心潮澎湃，然而描写心灵深处的微观世界的微微之情的散文，不也同样可以牵动人心，感人心脾、令人难以忘怀吗？对此我思考了很久。最近读了辽宁青年散文家李秋新出版的散文集《你让我的冬天绿过》(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让我对她的散文产生了两点新的感受。

首先，这本散文集在题材上追求微观性。作者是北方人，北方的冬天冷静，整个大地都在冷静地沉思着，作者也在沉思着从火热的内心世界分泌出来的微微之情。她选择《你让我的冬天绿过》作为书名，我认为是最恰当的。它体现了这本集子的总体基调——人的微微之情。李秋的散文没有“宏大叙述”，她把笔触紧紧地对准“显微镜”底下的生活小场面、小情节、小感受，然而却具有震撼心灵的“核动力”。正像她所表述的：“这个如期而至的冬天，在别人的眼里冷不堪言，可在我的心中却冷得开怀。”那年冬天，她微微地感悟到自从“你神话般地降临，我便不再是季节的奴仆了 ”。那年冬天，她未能同寒冷的大自然同行。而是闯入属于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独有的“世外桃源”。在那里她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快活，从未有过的冲动，从未有过的绿色。

这种流淌出来的真情牵动着读者的心灵，这是一种可贵的美学追求。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宏观走向微观，微观改变宏观。经济界人士近来常谈“细节决定成败”，散文创作也是如此，那些描写伟大题材的作品，其作品未必就因此而伟大，那些描写微观小题材的作品，其作品未必就因此而渺小。试问，以描写家庭小题材见长的“韩剧”，不是同样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吗！由此我感到李秋的散文魅力，正在于她捕捉到了游离于她内心深处的微观的新感觉。

其次，这本散文集在语言表述上追求精确性。这是这本散文集的一大亮点。她摒弃了那种人人都在用，人人都会用，放在哪里都适用的“经典”之言。也可以说她的散文基本上不用“典”。“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可谓人人皆知的经典概念了，但在那篇《你让我的冬天绿过》中，却被她排除了。因为她的心灵深处所感悟到的：“人是心情中的作品”，这种表述既新鲜活泼又精确。散文最讲究的就是“精确”二字。因为精确与否将决定着散文创作的成败。

关于语言的精确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引用”的精确；一种是属于通俗的精确。前者多指引用权威的经典之言，后者多指采用民间大众的俗语。前者是借用他者之言抒己之情，后者是使用俗语抒发自家之情。前者显得文雅十足，后者显得精确。然而人们大都喜欢贬俗、避俗，文人尤甚。岂不知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一切高雅经典的东西皆缘于俗。“经典”尽管备受崇尚，但它仍储藏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副作用。这就是它毕竟具有一定的、固定不变的思维指向或曰思维笼罩，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排它性。而且极容易产生一种思维惯性，又极容易形成无形的“语霸”。与此相反，民间大众的俗语，却具有一种自由的、生动的、活泼的属性。这两者，前者含有限制的理念，后者含有自由的理念。所以贬俗、避俗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贬值。可以说一个不重视俗语的作家，一个被经典意识魇住了手脚的作家，不管他自我感觉如何高大，到头来他的作品也只能是一个永远发育不起来的“侏儒”而已。

但丁说得好，“俗语更高尚，因为人类开始运用的就是它；因为全世界人都喜欢用它，尽管各地方的语言和词汇各不相同；因为俗语对我们是自然的，而文言是矫揉造作的”(见但丁《俗语论》)，当然但丁所指的俗语，是经过筛选的“光辉的俗语”。读李秋的散文，明显的感到她已经意识到了提炼俗语对她散文创作的重要性。所以她的散文阅读起来不感到伪情造作，只感到真情入脑。她是跟随时代步伐的年轻作家，她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时代变了，“一切被当作永久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了”(恩格斯语)。那种张口典故，闭口成语，“言必称希腊”者早已沦为当今的“孔乙己”先生了。

比如她对春夏秋冬的描写，几乎找不到重复哲人、圣人、名人的经典语言。她在那篇《春别》之情的散文中写到：“真想送你全程，但，我怕我的心太沉重，压在你的肩上；怕我的情思太乱，会缠住你的双腿”。她在那篇《夏游》中，更是直抒胸怀，说那彼此的“誓言是涤荡你我心头的甘霖”。她的《秋情》更显俗中见雅的精确：“你不是我的永远，但肯定是我的惟一，也许我不是你的惟一，但肯定是你的永远”。她的《冬恋》同冬天一样，排除了那“红红绿绿的伪装和假饰”去“追求着清寂”。这些都是经过她筛选过的俗语。虽然看上去语极淡但情极苦，虽然看上去言极浅但意极深。我想这就是她的散文因为善于运用精确的俗语，所获得的审美效应。

当然，笔者并不是贬低“经典”，而意在强调这“俗”在散文创作中所能起到的精确效应。经典固然重要，但俗语对散文来说就更为重要。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总是不愿意轻易重复他者的经典之语，总是喜欢从俗语中筛选出属于自己的经典之言，我相信李秋有这种潜能，我期盼着。

组织部又新来了年轻人！

——评大木著《组织部长》

□朱辉军

1956年，王蒙带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闯进文坛；2007年，大木又带来《组织部长》与我们相识。时隔半个世纪的关于组织部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看到了组织、人事系统的不断更新，也看到了文学家们与历史命运的交汇。

今天我们的重点尽管已经转向了发展，而且要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但改革及稳定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发展本身也要求不断改革，在发展及稳定的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国企、农村、教育、文化、科技、医疗、金融等各个方面，都需经由改革的方式才能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方面的改革，那就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长年在组织、干部、人事部门工作的大木，对此可谓有切肤之痛。于是，经多年之积累，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组织部长》。组织部门向来是一个具有威权的地方，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多少人为之神往，又有多少人因之止步！大木以其扎实的生活基础、熟稔的工作经验、深刻的理性思考，撩开了组织部门的神秘面纱。虽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话题，但作者在叙述有关事情的过程当中，借鉴了通俗小说的写法，从而使其十分引人入胜。一开篇，新任市委组织部长就神秘失踪，并被当做疑犯被镇派出所扣押，后又神奇脱险，接下来又有神秘人物在市《晚报》上发表相关漫画……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真是跌宕起伏，让读者爱不释手。到了结尾，作者还留下一个谜团：贾士贞会不会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一定的功力，作者善于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同时又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他们心理的波澜和对世界的思索，这就使作者大大超越了通俗小说以及写实文学，而达到了一定的文学高度。

当然，作者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是有不少深入的思考的，有的想法应当说也是很有见地的，是值得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重视的。但我觉得，作者还应再往高处想——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重组权力关系，让更多的真心为民服务而且德才兼备的人掌权、解除庸吏的权力、剥夺贪官的权力；往广处想——不是仅停留在干部人事范围内，而是要以此解放广大干部和各种人才的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进步服务；往深处想——通过对不合理体制、机制等的改革，最终改进世界、改善人生。以此拓展这一题材的内涵，扩充其社会容量，并进而获得更为深远的社会人生价值。

成人礼赞

□赵雅琳

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我怀着喜出望外的愉悦和惴惴不安的情绪，跨入了我的成人时刻。成人了，应该对自己有个说法，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心里，理当有一个成人的礼赞。

2007年6月16日，从18周岁生日那天起，我用了三天时间对我出生之地，即我家世代生息的地方，用脚和腿重新丈量了一遍它的横竖曲直。对于这片海土相依相连的神奇土地，自小我是“疯”过多次的，但冥冥之中往往实行着一个逆定理，越是熟，反而会视而不见。如果不是这方海土的主人发出特别邀请，如果不是陪同爷爷——大连市民营企业家赵日万及其好友阮振铭教授故地重游，恐怕我也难得会有新的颖悟。

我自备了一台精致的摄像机，跟随熟悉山海形胜的爷爷和倾其毕生精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学者，一边记录着，一边聆听着，一边感知着……

我们先是面对办公室地图上的大连揣摩良久，接着两位爷爷又让我用摄像机将必要的局部放大。我惊奇地发现，如果说中国的版图酷似一只雄鸡的话，那么雄鸡啼鸣处无疑是在大连及其辖区。雄鸡报晓，鸣镝飞奏，既有震撼世界的高亢主旋，又有迂回多变的属音，从肩负着四分之一人类欢欣与苦恼、憧憬与忧思的母体中发出，迎着太平洋温暖湿润的季风，射向东方、射向世界。

我们一步又一步，终于攀登到了辽南最高峰——大黑山之巅。从这里仅用肉眼便可以看见大连地形瓶口处的黄海与渤海。用摄像机一推、一拉、再一摇，那自然景观历历在目。你看，两面吹来的海风，两面夹击的潮汐，一个舒舒展展地推送与描摹着细密流畅的线条，一个浩浩渺渺地冲拔与裹挟着奔放豪迈的笔触，各自独特又相互关连地勾勒着、挥洒着……这，也许是亿万年海陆板块的挤压与浸淫，抑或是天地神明的孕育与昭示，反正这里成了世界罕见的两海——渤海与黄海间最狭的夹角地带。

我们在大连开发区政府接待室看到一本精美的画册《半岛明珠》，开篇第一章便是该区的原形照片。感谢当年的拓荒者，由空中给我们留下历史惟一的印迹，土路、茅屋、零星之耕地和有限的绿色，显示出少有的蛮荒与苍凉。只有远处的海与土犬牙交错的形态让人浮想联翩。

这里原是东方夷人集团繁衍生息之地，也是古太平洋文化某些因子的内核和源头。但在中世纪之后，由于封建的束缚和禁锢，才使它经历了漫长的坎坷之路。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里仍是荒芜一片。中国人世世代代相继艰苦奋斗的努力，虽使这个世界永远感到敬佩，但熬过了世间少有的屈辱与不平的岁月之后，人民最大的觉醒是呼唤改革开放、科学民主，而一批从历史的阵痛中走出的领导者便顺应潮流，一举推出半月形的黄金海岸开放带，从而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同当代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正是在中国这一新的转型期内，此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才获得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一座融汇现代中外工业文明并发挥着商品经济规模效应的新兴城区——大连开发区，在昔日沉睡多个世纪的土地上倏然出现，并仅用五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跨过发达国家早期百年创业的必由之路，而一跃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窗口。

为此，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不惜一切地摈弃平庸，他们将一往情深地任劳任怨地辛勤工作。每个局外人都深信，顺着自己所开辟的路走下去，不辞辛苦地播种、耕耘下去，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当我们在这黄海与渤海的夹角地带上浏览观光之后，我们不仅由衷地感受到它因华美而矜持、因富有而远藏的性格，还感受到它执意让每一个探求者用长途的艰辛换取应得的报偿——即生生息息、吐纳百代的海土。最令我倾倒与痴迷的莫过于一群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所发出的生命的咏叹！

我们挽起裤角，蹚着海水，慢慢走近它，远观其浩渺，把玩其精致。这是由一块块、一丛丛、一堆堆，或是方、圆、多棱多角，或是彼此相通、相扣的彩石构成的“玫瑰园”；这是座落于海中的“海龟探子”、“大鹏展翅”；这是由海水磨刷、洗涤与镶嵌的“九龙壁”；这是闻名遐迩的巨大“龟裂石”，它生成于六亿年前，迄今世界绝无仅有，那一道道甲纹龟络，是海风巨浪亲吻啄食的印痕，又是自然与历史分娩与铸刻的梦幻。

这是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饰与塑造出的人物生肖灵像。海水浮托着的巨大头颅和宽厚的肩膀，蓬勃的长发，浓密舒展的连鬓胡须，粗犷的眉毛，挺拔的鼻子。一张如同太阳的脸，耀眼地亮，令人知道它在何处。

他是谁？是不是那个一生穷困、孤独、浸透在痛苦之中，却给世界带来欢乐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好，再靠近一点，只要我们喜欢音乐，喜欢从音乐中读出人来，大师便是我们“知心”的朋友。当他从痛苦生活的纠缠中拔出脚来而略感疲惫之时，到这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心灵，立刻获得无可言喻的力量。于是，生命之水活泛泛地流淌，天分和良知所哺育的音符跃然成永恒。

当我们这些历史的后来者，沿着金马路和辽河西路，漫步在快、慢、步行分道而绿荫成片的大道上，下榻在每每超群又合群、迥异且协调的座座星级宾馆里，娱乐在东方庭院式或欧美情调的场所中，眼见着大城市不复再见的湛蓝的天空，呼吸着清纯、鲜美、甜爽的空气，你能想像出23年前这里的情景吗？